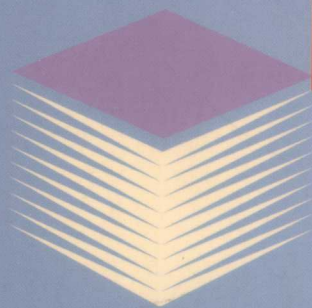




贺敬之诗选

贺敬之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27
272

文学类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贺敬之诗选 / 贺敬之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

(中国文库)

ISBN 7-02-004541-3

I. 贺… II. 贺…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6657 号

责任编辑: 王清平

整体设计: 李 梅

胡建斌

责任印制: 董文权

贺敬之诗选

Hejingzhi Shixuan

贺敬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75

字数: 368 千字 印数: 0,001—3,000

ISBN 7-02-004541-3

定价: 25.00 元



作者像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宋木文 陈 原 徐惟诚

主 任：杨牧之

副主任：聂震宁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田胜立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辉 杨德炎
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汪季贤
汪继祥 宋焕起 胡守文 邵宗远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中国文库”第一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 员：

陈有和 管士光 于殿利 李 岩 刘晓东

程大利 潘振平 孙延凤 李师东 李济平

陈鹏鸣 马国华 胡建斌 潘 平 杨 静

孙 牧 乔先彪 贾立钢

代 序

——《中国新诗库·贺敬之卷·卷首》*

周 良 沛

贺敬之(1924.11.5—),曾用笔名艾漠。山东峰县贺家窑(今枣庄市郊)人。^①这是一个穷困、闭塞的小村子,父母是贫苦农民。童年时,他靠亲友的帮助,进了一所私立小学。1937年暑假,他考上了设在滋阳县的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进这个学校,每月有五块钱补贴,可以解决伙食问题,因而报考的都是穷学生。贺敬之当时只想有个谋生的职业,考取了也就很满意。此校学生年龄不限,最大的有二十多岁,一般的十七八岁,而他当时只有十三岁,是最小的一个。不料,他入学没几天,日本侵略军打过了黄河,直逼济南。学校急忙动员学生回家。随后,山东的一些中等学校纷纷迁往湖北,组建“国立湖北中学”,总部设在鄂西的郢阳,师范部则设在均县。1938年春,母亲把家中仅有的五块钱缝在他的衣角里,送他与几位同学一起找学校去。步行加扒车,挨饿又冒险,他终于找到学校。“当时抗日如火如荼,这个武当山下的城市一下沸腾了,日日夜夜唱着抗日歌曲。冼星海的《我们在太行山上》,这首歌就像专给他们写的,均县的人民几乎都会唱它。县城的南北大街贴满了学生的壁报,这些壁报从各个角度,反映了青年学生抗日的胸臆。这时学校的课

* 此文收入本集时,作者曾作了部分修订。

程较少,国文课,有的老师选讲了抗日有关教材,给学生们提供了宣传资料。贺敬之是搞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下乡宣传,也写宣传稿件。这时他已经以诗为武器参加了战斗。他的国文老师有时把他较好的富有战斗性的诗,从‘作文本’上选出来,张贴在教室里,叫同学观摩。可惜现在无法找到这些底稿了。”^②可是,汉江水时落时涨,学校里也不平静。国民党战干团来学校招生,欺骗青年上钩。师范部的课程增加了军训,派来军事教官,推行法西斯教育。1938年10月后,武汉在日军的炮火下已岌岌可危,学校再度西迁入蜀。他随校经陕南步行入川。校名由“国立湖北中学”改为“国立第六中学”。总校设在四川绵阳,贺敬之进了设在梓潼县的第一分校。但在罗江县的四分校有作家李广田、陈翔鹤和诗人方敬当教员,于是,贺敬之想转到四分校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文学修养。为此,他曾冒雨打伞步行二百华里找到李广田。那时,李广田和他朋友办的《锻冶厂》已铅印出版,影响不小。四分校的学生已挤不下,他劝贺敬之,读书在哪里都一样,“有了作品可以给他看,可以发表”。贺敬之回梓潼努力写作,跟同学们办起了“挺进读书会”,书籍是节衣缩食、用几个人的伙食尾子集中起来买的。贺敬之后来在诗中写到他在倾圮的文昌庙隐蔽的角落里,“和我的小伙伴们/躲过/三青团的/狗眼/传递着/我们的‘火炬’——/我的《新华日报》/我的《大众哲学》……”正是那时的情景。也正是对学校当局发行《黄埔日报》,请三青团的干事长任觉五到校讲《孔夫子的大同世界》所展开的正面争夺战。而且,贺敬之和同学们,在学校众多壁报中,办起他们引人注意的《五丁》。那时的贺敬之,也已在全国性的报刊,如《大公报》的《战线》发表他少年时的作品了。高年级与他来往较密切的李方立、顾牧丁后去成都谋生,编《新民晚报》副刊,他以“艾漠”为笔名在上面发表的作品就更多,为更

多人熟悉了。但，随着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全面铺开，三青团已可以公开没收同学的进步书籍，“查询并登记订阅《新华日报》的同学姓名。教育部竟派人审讯参加抗日宣传的积极分子”。贺敬之和他的伙伴，“在无水的古井的砖缝间撬开墙上的砖，把书藏在墙里，藏在郊外的墓穴里，藏在荒草里……然后选取敌人不注意的时候，才取出来学习。”^③1940年4月，李方立从成都来找贺敬之，并约上程芸平、吕西凡一同步行往延安。历时四十余天，行程极为艰险，但内心无比欢欣。途中，他以《跃进》为题的组诗，后来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

他初到延安，先进徐特立为院长的自然科学学院中学部上高中，后考进了鲁迅艺术学校文学系第三期。当时，他只有16岁。亲自面试他的系主任何其芳称他为“一个小同学”。从小经历了长长的流亡生活的贺敬之，在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中，阅读了“五·四”以来的及许多中外名著，勤奋写作，除了有表达他初到延安时面对新生活的感受的《并没有冬天》外，还有回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家乡生活的《乡村的夜》等作品。

1942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精神的号召下，他走出学院，开始和革命根据地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在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基础上，以他为主和丁毅等同志集体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一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以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焕发的美学光彩，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为我国新歌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石，开辟了道路。该剧曾被搬上银幕，译成多种外文，改编为多种形式在许多国家上演过，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贺敬之从而也以剧作家闻名于世。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文艺工作团到华北，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土改、支前等群众工

作。1947年参加青沧战役，立功受奖。这期间，他创作了秧歌剧《秦洛正》，诗人写的表现根据地人民生活 and 军民关系的诗篇，其中的《南泥湾》、《七枝花》、《胜利进行曲》、《平汉路小唱》，一经作曲家谱曲，它们就都长上了翅膀，广为传唱。

1949年7月，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全国剧协理事和作协理事。后到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任《剧本》、《诗刊》编委，剧协书记处书记等职。可是，青少年时的不幸，生活对他的摧残所埋下的病疾，在他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之际，却迸发出来了。他很多时间都住在医院和疗养所，加之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在办公桌上办的，深入生活和创作的时间很少，那段时间他几乎没写什么东西。

1956年，因一次重回延安的激动而写出的《回延安》，使剧作家贺敬之又回到诗坛了，诗人贺敬之的歌声又在四处飞扬。1956年“七·一”前夕，他那一千八百行的长诗《放声歌唱》，特别是1963年又一千二百行的《雷锋之歌》，不仅标志了他的诗的成就之高度，而且更是开一代诗风之作。作者的政治热情和作品的诗美，得到读者的认同和赞赏，为新诗史写下了很有光彩的一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笔已不可能用于歌唱新中国的新生活，只能写“交代”、“检查”。1969年获得“解放”。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对出版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放歌集》，也以此为给更多的文艺书籍的“解放”而投石问路。不料，“四人帮”一伙马上警觉起来，把这本书的重印，跟诗人没有写他们要他写的、做他们要他做的事联系起来，做为“黑线回潮”、“右倾复辟”的“新动向”来抓。一方面，通知不许将诗人的作品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不许选入课本，并下令组织文章批判；另一方面，下令诗人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再次进行会议批

判,加以围攻。最后,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批示:长期下放、监督劳动。

此时,贺敬之的夫人、诗友和战友柯岩,自然不可能再像动乱初期那样怒目挺立在“造反派”面前,用义正词严的辩论和一张张大字报回驳他们对贺敬之的诬陷和迫害,而只好强忍义愤,为防新的不测帮贺敬之赶做行前准备,用“相信”二字代替“再见”,目送贺敬之被执行人员送往监督劳动的所在地首钢炼钢厂。“相信”,这是自“文革”他俩同时遭难以来一有机会就倾谈的话题:相信真正的人民群众,相信党的健康力量,也相信自己走过的和将走的道路。这样,贺敬之作为“四人帮”亲批的一名要犯,在首钢果然也和柯岩下放劳动的情况相似,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暗中保护。在“四人帮”进一步猖獗的日子里,老战友辗转告诉他病重的周总理提起了他的名字和他的《雷锋之歌》。周总理去世后,当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对“四·五”的血雨腥风而捶胸顿足之时,来探望他的工人师傅把传抄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诗页偷偷塞在他的枕下并悄声告诉也转给柯岩……

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的新作《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表达了他抑止不住的喜怒交织之情。之后,他出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负责落实政策的工作。他为长期蒙冤的许多好同志,包括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1957年“反右”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一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当时,文化系统有几十位在1958年已被当作“右派”弄到边沿地区遭受不少磨难的同志,最后查档案竟都是没有经过正式审批手续,因而也无案可查的“错划”者,若不以“错划”处理,则只能被当地安置,他说:“这些同志不就是为了‘右派’这顶帽子吃了那多苦嘛,怎么可以在落实对‘错划’者的政策时,反而把按当时组织手续都不是‘右派’而又当作‘右派’的同志抛开呢?”他以实事求是

是,对人负责的态度,通过组织将他们先调回北京再一个个具体落实政策。在中国文坛几十年风雨不休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1980年,他参与了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复查并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工作。1986年6月,“对胡风同志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后,又进一步予以平反”,认为,对“胡风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这一论断,“经复查认为,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的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由中央文件作出决断。因此,这个问题也予撤销。”^④贺敬之在其时其位,正是具体促成和执行这一政策的当事人。他是以实事求是的大勇,排除了各种“左”和右的干扰,使之得到贯彻执行。他虽然由此少于写诗,甚至无空写诗了,但他的工作,却解放了许多有才华的诗人,解放了他们的诗……

古稀之年,体衰多病的诗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练书法,吟旧体诗,偶尔也有似旧体又不完全拘于旧律的作品,又见诗人新的艺术追求。

诗人有诗集《并没有冬天》(上海泥土社,1951.9)、《朝阳花开》(作家出版社,1954)、《放声歌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乡村的夜》(作家出版社,1957)、《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雷锋之歌》(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回答今日的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以及《贺敬之诗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并有《贺敬之文艺论集》(红旗出版社,1985),还有贺敬之为主要执笔人的集体创作《白毛女》(张家口新华书店,1946)。

如果说《白毛女》是可歌唱的新歌剧,使贺敬之以剧作家闻名于世,那么,作为文学脚本,它却应该看作诗剧。这,正好说

明，贺敬之的剧都是无法和他的诗分开的。何况，诗人写出《白毛女》之前，就已经写出《并没有冬天》、《乡村的夜》这两部诗集中的全部作品呢。

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男女老少，不知道《白毛女》的故事的，真是太少了。它是根据晋察冀边区河北西北部流传的一则新传奇写成的。说战前村里一恶霸，平时欺压佃户，荒淫奢侈，无恶不作。某一老佃农(剧中之杨白劳)有一孤女(剧中的喜儿)，聪明美丽，被恶霸(黄世仁)看上，乃借讨租为名，阴谋逼死老农，抢走该女。她到财主家，被凌辱奸污后，又被厌弃。财主续娶新人，筹办婚事，正要暗谋出卖该女之际，一善心的老佣人乃于深夜把她放走。她背负仇恨、辛酸，找到一个山洞住下，由于山洞中没阳光，不吃盐，她已全身发白。晚上跑到奶奶庙里偷供果，被村人信以为“白毛仙姑”，香火更盛，而她也借此以度日。抗战爆发，八路军来了，将这被旧社会逼成鬼的“白毛仙姑”重新变成人。……当今，无论中国的现实发生怎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旧中国若是没有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就没有今日的一切。这是铁的历史，是任何人用任何方法都更改不了的。

以此为历史作证的贺敬之，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中国农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对他的人生和艺术，都烙下很深的烙印。他的那组《乡村的夜》中写到腊月的寒夜，被炊断妻病之灾逼得卖儿的小全他爹，在回家的路上数着卖儿的四吊五百钱时，一个将死的弃婴在泥坑中的哭声止住了他的脚步，他恍惚听到自己卖去的小全在哭，他抱起这弃婴说：“谁家生了你，小孩，把你扔在这里，呵，狠心的人！”由此，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也是在咒骂自己，他又把卖儿的钱留下一吊给这弃婴，这弃婴还是死了。若要讲“人性”，诗人将这苦难之中的农民的人性光辉，得到艺术的升

华。而那为饥饿又寒冷而卧病不起的母亲能听到煮食之声并有炊火之暖,为此却在烧自己一条残腿的“铁拐李”,及一个“荒乱年成,再也打不起租子”而卖了儿,妻上吊的农民,喝醉想忘记苦痛也死在妻子坟前的“醉汉”。还有那被“赵大爷”一再迫害而出走,几年后带着枪和伙伴回来报仇、破仓济贫的“黑鼻子八叔”,终于被地主带来的“官兵”包围而壮烈牺牲的悲剧,都是我们“乡村”的黑“夜”里的故事。诗人写农人心灵的痛苦、扭曲、人性、异化,比起同时期、同类题材的作品,是另有特色的,比起新诗早期为“文学”的“平民化”而以知识分子对“劳工”的“人道”所予以的同情而写的诗,又生动、深刻多了。黑暗中的人们是盼黎明的。贺敬之能为他熟悉、忘不了的农民写“太阳出来”时“白毛女”的翻身事,也是在圆这农民之子的梦呵。

然而1945年6月10日,鲁艺为“七大”首演《白毛女》后,在上而下肯定、赞赏声中,当时就有自以为是“现实主义”的捍卫者,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它不是“现实主义”的;不想,九十年代对《白毛女》又有《故事新解》^⑤,已引起各方的关注。它说“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看问题的方法”,说该“撇开贫富差距这个社会问题,而从经济关系的角度考察”,从那什么现代经济法的角度看,“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本来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债权人以适当的方式向债务人索取债务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经济法,当借债的欲望发生,只有在借取的一方有能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借贷关系才能成立”。“在现代西方社会如果有人要向银行贷款,就是这个道理。而杨白劳是赤贫,根本没有偿还能力。因此这一借贷关系本不应该成立”。然而,杨白劳的“头脑发热。产生破坏性的冲动”——自然是指剧中的杨白劳为财主要抢走他女儿,逼得他在服毒自杀前“我要和他们拼了”的仰天呼号。这在有“新的看问题的方法”者来看,自然是

有违“现代经济法”的大逆不道的行为了。照这一先生所说：“对贫穷如洗的杨白劳们进行扶持和救济，使他们脱贫致富，应当是社会的责任。”

然而，要是有一个愿为杨白劳尽到社会责任的社会，帮他“脱贫致富”，还可能发生《白毛女》的故事么？可是，为什么新社会帮助贫困户的“脱贫致富”，在旧社会只能是天方夜谭呢？而杨白劳所以被逼死，却恰恰是由于一个帮助支持老财压迫剥削杨白劳的统治集团，是这样在尽它的“社会责任”而形成的悲剧！

现在所以要说这些话，正是因为有的人过去用文字很热情地赞扬了贺敬之的诗，后来也为“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看问题的方法”，像看《白毛女》那样，对贺敬之的诗，又完全推翻他们自己作过的评语。

可是，可以这么说，贺敬之的诗，在过去，在现在，它的价值和意义却是不可能为什么“需要”而变的，变了的“看问题的方法”并不能变了贺敬之的作品本身及它的价值。

若以《白毛女》为中点，那么，在这之前他的《跃进》写他为摆脱法西斯教育和白色恐怖投向革命“喘息着，摸索向远方……”“是不倦的/大草原的野马/是有耐性的/沙漠上的骆驼……”的韧性，和《白毛女》的喜儿逃出黄世仁家喊出：“……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的呼声，再到《雷锋之歌》——

是你
还是你呵
——中国！

让我一万次寻找：
是你